

中非关系的发展与非洲中国新移民^{*}

李鹏涛

(浙江师范大学 非洲研究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关键词] 非洲; 移民研究; 新移民; 中非关系; 公民安全

[摘要] 本文从新移民的规模、特点、构成类型及其与当地社会关系等方面, 简要分析了中国在非洲新移民群体所普遍存在的问题。认为中国新移民与当地社会某些阶层经济利益上的竞争关系、中国新移民相对封闭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所在国的政治斗争和政治动员以及西方媒体的渲染歪曲等因素, 影响到新移民与当地社会的关系。就目前情况来看, 除少数的移民个人具有较为突出的成就外, 新移民群体还没有达到足以在非洲各国产生影响的程度。语言、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可能会妨碍新移民融入当地社会。

[中图分类号] D634.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 (2010) 04-0024-07

The Development of Sino-African Relations and New Chinese Migrants in Africa

LI Peng-tao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Key words: Africa; migration studies; new migrants; Sino-African relations; civil secur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a number of aspects of the new Chinese migrants in Africa, such as the migration scale, characteristics, typ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Chinese migrants and local societies, followed by a discussion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being faced by Chinese migrants. Several factors are listed to account for the unhealthy relations between new Chinese migrants and local societies, including the economic competitions between Chinese migrants and a certain local social groups, the relatively closed cultural and life style of Chinese migrants, the complicated politics in host societies, and the distorted propaganda represented by Western media. The author contends that apart from a few successful individual migrants, majority of new Chinese migrants have not yet achieved economic success to influence local societies. The differences in languages, cultures and values are likely to hamper new Chinese migrants from assimilating into host societies.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与非洲的联系日益增强。随着中国大陆企业广泛投资于非洲各国的基础设施、能源、矿产、农业等领域, 大量新移民^①涌入非洲, 成为当代中国新移民研究中值得关注

[收稿日期] 2010-08-20

[作者简介] 李鹏涛 (1981-), 男,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非洲历史及当代中非关系研究。

* 本文系作者在非洲数国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撰写而成, 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期中非合作关系研究》(项目编号: 09JZD0039) 的阶段性成果。

① 目前学界对于“新移民”的定义仍有较大争议, 本文中“新移民”系指改革开放以来移居国外的中国大陆公民。大陆新移民大规模进入非洲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

的新现象。近年来，西方媒体和一些非洲国家的政治派别大肆渲染中国新移民对非洲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并以此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1]而在南非、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苏丹等国出现的伤及华侨华人的恶性事件，更是引起了国人对于在非华人人身安全的高度关注。

随着近年来中非关系的迅猛发展，国内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较多侧重从政治和经济层面分析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而对于随之而来的新移民与当地政府、社会间的关系则关注较少。^①非洲各国国情、历史差异较大，各国的中国新移民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本文试图在实地调研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从规模、特点、构成类型及其与当地社会关系等方面，简要分析中国在非新移民群体所普遍存在的问题，以期丰富华人新移民研究的视野。

一、新移民的规模、类型与特点

（一）规模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两种资源、两种市场”战略决策的制定实施，大陆企业大规模进军非洲，与此同时，很多非洲国家也放宽了移民政策，因此出现了中国移民非洲的热潮。在过去不到十年间，非洲大陆的中国新移民呈激增态势。新移民规模是争论的热点问题，但并无确切统计数据，各种说法之间分歧较大。综合各种数据，如果将老华侨华人与新移民合并计算，非洲华侨华人数量已从世纪之交的10万增至目前的50万左右。^②南非的中国新移民数量最多，现有的20~30万华侨华人绝大部分是新移民。据非洲本土和西方学者统计，截至2006年，尼日利亚、苏丹、安哥拉、坦桑尼亚、阿尔及利亚和毛里求斯等国的华人规模超过1万，基本上以新移民为主。此外，1990年纳米比亚独立时几乎没有华人，到2006年已增至万人左右，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各有约5000和4000华人。^[2]

非洲国家移民政策法规不完善，人口统计数据不准确，中国劳工移民流动性较大，再加上中国人与日本人、马来西亚人和韩国人外貌体征差异并不明显，这些是造成中国新移民数量难以统计的主要因素。新移民中包含大量通过非正常渠道出国者，由于这部分人数难以统计，也造成新移民规模统计上的困难。此外，某些非洲国家的政治力量和新闻媒体为了渲染中国新移民对当地的负面影响，会故意夸大中国新移民的数量。例如，赞比亚反对党声称本国有数万华人，但实际数量远不及此。^[3]

（二）类型

少量的中国留学生主要集中在南非、埃及等国，也有一些移民是把非洲作为前往欧洲的踏板，这两类移民的数量较少。非洲的中国新移民大致分为两类：

1. 劳工移民

目前在非洲大陆的中国国有和私营企业近1600家，广泛投资于基础设施、公共工程、矿业、能源、通信、农业和服务业等领域。这些中资企业在雇佣当地员工的同时，也从中国国内招聘或派遣员工。据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在非从事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人员的数量呈激增态势，从

① 就笔者所知，目前国内关于中国对非移民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历史性回顾，关于当前中国在新移民的研究相对较少，相关研究成果参见葛尚公：《非洲华人研究的若干问题》，《世界民族》1999年第1期；李安山：《炎黄子孙在非洲》，《西亚非洲》2000年第1期；朱慧玲：《非洲侨情及其特点》，《八桂侨刊》2002年第1期；何敏波：《非洲中国新移民浅析》，《八桂侨刊》2009年第9期。

② 北京大学李安山教授认为，如果将第一批华人与目前正在奋斗的新移民一起计算，非洲华侨华人约有50万人；法国学者马蒙（Emmanuel Ma Mung）估计约为27~52万人；美国学者布劳提冈（Deborah Brautigam）估计目前非洲华人数量应在75万人以下；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2009年的一份报告估计，非洲华侨华人数量约为58~80万人。

1998 年的 3.9 万人增至 2007 年的 11.4 万人。^[4]

这些劳工移民除少量是通过直接的政府间协议外，多数是通过得到政府许可的私人劳务输出公司或者同乡、亲属等非正式社会网络前往非洲的。例如，江西国际公司是直属江西省政府管理的国营企业，也是国家商务部最早委派投资非洲的单位之一。它抓住了“走出去”较为有利的时机，先后在马里、加纳、赞比亚、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博茨瓦纳等国从事援外工程和工程承包业务，大量江西省和其他省份的劳务人员由此进入非洲。江苏国际、河南国际、中色集团、上海建工、华为通讯等在非洲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带动大批中国劳工走出国门。劳工移民可以具体划分为从事体力劳动和从事管理和技术工作两类，他们大多会在合同期（一般为 1~3 年）满后返回中国，但也有很多人看到非洲存在巨大商机而选择留在非洲开创自己的事业。

2. 投资移民

这类投资移民规模大小不一，分布范围极为广泛，涉及建筑、矿业、纺织、农场、通讯、钢铁、木材、餐饮、医疗、商贸等，几乎无所不包。由于国内市场竞争激烈，而欧美的投资起点高，非洲作为最后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以其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吸引着无数的淘金者。通过在非洲的竞争磨砺，在非洲寻求发展商机，从而获得适应国际竞争的能力，并最终走向欧美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正是中国私营经济投资非洲的战略价值所在。随着国内民间资本的壮大，大批中国人带着资金、商品和技术飘洋过海来到非洲这块相对贫困但却商机无限的大陆。据中国国家进出口银行统计，截至 2006 年底，在中国对非投资的 800 多家企业中，近 700 家是私营企业。此外，来自国内不同省份的个体经营者，分布在非洲的广大乡村从事小规模的经营活

动，提供了大量的“即使是最边远贫穷地区的非洲居民也购买得起的商品”。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全国委员会成员乔·莫洛指出：“（在莱索托这样的小国里）仍然可以看见很多中国商人，甚至在深山老林里也能见到中国商人的身影。”^[5]

除了分布范围广泛的中国零售店铺外，一些非洲大城市也出现了中国批发商，其中规模最大的集中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包括中国城、亚洲城、香港城等，这些构成了整个南部非洲地区的贸易中心，辐射范围包括南非及邻国博茨瓦纳、莱索托、津巴布韦和安哥拉等国；卡萨布兰卡、阿克拉、雅温得和杜阿拉等城市也都有中国商品批发市场。

此外，很多中国新移民在非洲国家开设诊所，其中很多人曾是援非医疗队队员。自 1963 年向阿尔及利亚派出医疗队以来，中国已向 45 个非洲国家和地区派遣（过）医疗队。^[6]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些中国援非医疗队队员完成派遣任务后留在当地，主要集中在坦桑尼亚、莫桑比克、赞比亚和博茨瓦纳等国。例如赞比亚的中国援非医疗队来自河南省，很多医疗队员在完成任务后继续在这里开办诊所，如“仲一诊所”、“友谊诊所”等。“仲一”诊所的冯轲红大夫原是医疗队的一名中医大夫，期满后毅然重返赞比亚开办诊所，凭借精湛的医术和热情服务而赢得了当地患者的信任。这些诊所对提高当地医疗水平，促进中非民间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7]

（三）特点

相对于“老侨”而言，新移民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 来源地趋于多样化

中国的沿海省份，尤其是广东、浙江和福建，数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海外移民的主要地区，这些地区也是非洲中国新移民的重要来源地。与此同时，山东、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辽宁、江西等省份也有大量新移民。此外，还有很多移民发现在原居住国难以立足，因此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匈牙利等欧洲国家或者非洲大陆其他国家再迁徙，例如很多浙江温州商人在法国生活多年后选择移居讲法语的非洲国家，而佛得角的一些讲葡萄牙语的中国人因为面临中国新移民的激烈竞争，因而移居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等葡语国家。此外，也有一些南非华人迁徙至纳米比亚、赞比亚和博茨瓦纳等南部非洲国家。^[8]

2. 移民动机单一鲜明

不同于“老侨”和其他地区的新移民，非洲新移民中持“过客”和“候鸟”心态者居多，并未将非洲作为落地生根、安家落户的地方。新移民们普遍认为，在非洲“吃苦受罪”只是暂时的，是为了回国后更好地生活，因此这些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不过，也有很多新移民觉得当地发展空间大，自然环境适宜而选择长期定居下来。新移民最终是否会“落地生根”，取决于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以及中非经贸、政治关系的整体态势。

3. 发展速度极快，尤其是在零售、批发和餐馆等行业

由于工业基础薄弱等因素，非洲大部分国家的基本消费品多是从发达国家进口，价格高昂。中国商品由于其低廉的价格而对一般非洲民众具有极大吸引力。马达加斯加的中国商品要比本地或者进口商品便宜2~3倍以上。^[9]中国商品的价廉物美是华人新移民能够在零售、批发等行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这些在非洲市场起家的中国商人启动资金都比较少，多则数万美元，少则几千美元，凭着吃苦耐劳、敢闯敢想的精神在非洲开拓事业，这个群体的发家速度非常之快，多数只用十几年时间便成功创业，有的甚至更短。

二、新移民与当地社会的关系

总体上讲，中非经贸关系的深化推进了非洲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使广大非洲民众从中获益，非洲民众对于中国投资者和新移民持欢迎态度。

（一）中国新移民的涌入以及中国店铺的快速增多，降低了当地日常生活用品价格，提高了非洲一般民众的购买力

较早来到非洲的中国新移民开设店铺，由于商品价格具有极大优势，因此迅速抢占了当地市场，这吸引大量的中国新移民竞相开设商铺。由于竞争较为激烈，很多店主会选择迁徙到更为偏远的地区，从而使得日常消费品价格大幅下降，非洲当地民众的购买力得以提升，很多非洲国家都出现类似情况。^[10]以佛得角为例，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短短几年时间，华人商铺遍及全国各地，日用消费品价格大大降低，当地民众生活得以改善。此前很多人一直靠在欧洲打工的亲友邮寄旧衣服和生活用品，现在他们可以在本地市场上买到价廉物美的商品。^[11]在民主刚果首都金沙萨，中国商人刚开始每双鞋卖12美元，随着华人商贩的涌入，价格跌至每双6美元。^[12]

（二）中国新移民群体在非洲的投资经营活动促进了非洲经济社会发展

基础设施落后、制造业薄弱严重制约着非洲国家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投资严重不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基本上放弃了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例如，2005年美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绝大多数集中在石油领域，只有10%投资于制造业。同西方投资者相比，中国投资者并没有集中于自然资源开采，而是较多地投入到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截至2007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已为非洲的有关项目提供了132亿美元贷款，其中电力行业的贷款占40%，交通运输占20%，电信占12%。^[13]这对于改善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状况、提高非洲自主发展能力等都将起到重要作用。非洲开发银行行长贝鲁卡也曾表示，中国对非洲贸易和投资将激发非洲经济发展活力，使非洲能更快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越来越多地流向服装制造业、电信、家电产业及零售业、渔业和服务业领域，可使非洲经济避免过度依赖资源行业。^[14]

（三）中国新移民所表现出的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精神对非洲民众对待工作和生活的态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总体而言，非洲各国仍处在现代化巨变之中。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非洲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会逐渐发生变化，竞争、开放、效率、秩序、创新等意识会逐步成为民众的主导观念，进而推动非洲社会的现代化进程。^[15]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新移民对非洲民众的生活、工作观

念产生了积极影响。有学者对非洲的中资企业进行实地调研时发现，中方员工的守时高效、勤俭节约、吃苦耐劳，对周围的非洲员工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16]

与此同时，由于近年来中国新移民增长速度很快，难免鱼龙混杂，一些新移民漠视当地法律，不能约束自身行为，甚至不讲诚信道德，违规偷税，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反感。廉价的中国商品和大量的华人商贩对当地纺织业和零售业构成了一定威胁，从而引发对立和冲突。一些非洲媒体和西方媒体的大肆渲染更使得这一问题被夸大，不少非洲国家的中国新移民处境堪忧。坦桑尼亚、刚果（布）、尼日利亚、多哥、贝宁等都曾发生过针对华人的查抄事件，当地政府和移民局突击检查中国移民的签证和护照，其主要目的通常是借机敲诈；赞比亚、莱索托等国都曾出现反对党在大选中为赢得民众支持而要求把华人赶出本国，理由不外乎华人在当地的商业经营中抢占了当地人的商业市场和就业机会。事实上，劳工标准问题不仅存在于中资企业，非洲本土企业及印度人、西方人企业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但是唯独华人企业成为了关注的焦点，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新移民与当地社会关系所出现的问题主要是以下几方面原因造成的：

（一）中国新移民与非洲国家特定社会阶层在经济利益上的竞争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非合作逐渐实现了从注重无偿援助到强调互利双赢的转变，力图实现援助非洲发展的道义责任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发展需求的结合。事实证明，中国的这种迥异于西方的援助理念，对于推进非洲经济社会发展而言更为有效，这一点也为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所认可。^[17]

但是，在具体的经贸关系中，个别的中资企业和中小业主的行为，影响到与当地社会的关系。例如，在中非贸易领域，一方面，中国商贩为当地民众带来了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提高了普通民众的购买力；另一方面，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中国商贩低价倾销、破坏当地销售网络的行为和现象，客观上对一些国家的纺织业和贸易特别是零售业构成了一定冲击。这就使得非洲国家民众对中国商贩和中国商品产生了一种较为复杂的心态。赞比亚前贸易部长的话反映了这一点：“赞比亚需要中国投资者在我们的市场里兜售鞋子、衣服、鸡肉、鸡蛋么？赞比亚人完全可以自己干这些活。”^[18]

事实上，中非经贸关系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非洲国家自身经济发展问题的反映，正如一位南非商人所说：“南非为什么不能生产同样具有竞争力的商品呢？中国人是在付过运输费、关税之后才能把产品运到南非的，但是他们的价格仍然低得多。（南非）纺织业……必须使自己的产品具有竞争力。”^[19]事实上，早在中国纺织品涌入南非市场之前，享受着30%~40%关税保护的南非纺织行业一直处于衰退过程之中，所谓的“中国纺织品造成南非本土纺织业困境”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南非经济学家也承认：“南非纺织业的衰退是由于南非生产者并未加大投入以提高产能、技术和管理，南非货币汇率不断上涨，南非劳动力生产效率较低和内部成本较高的因素造成的。”^[20]而且，中国政府为了减少中国产品在南非引发的争议，在2007—2008年间对出口至南非的31类纺织品和服装实施限制性配额，还同意为南非的纺织品和服装业培训计划资助250万美元，并愿意“在必要情况下向南非提供优惠贷款，以促进南非纺织工业的现代化”。然而，遗憾的是，南非政府和相关企业仍未抓住时机实施产业结构重组。^[21]

（二）新移民相对封闭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除南非、马达加斯加等国华侨与当地社会文化融合程度较深外，其他非洲国家的中国新移民到非洲时间较短，再加上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异，因此尚未能融入当地社会。据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非洲的印度人店铺一半是由当地非洲人管理的，而93%的华人店铺是由华人自己管理的。^[22]这种情况也明显表现在劳工移民群体身上。为了避免中方员工因不熟悉当地环境而引发的“麻烦”，中资企业习惯于“封闭式管理”，劳工移民大多生活在封闭的大院中，与周围社会

隔绝开来，与当地社会很少联系，一旦出现问题之后，往往习惯于花钱了事。

随着中非经贸关系的深化，由大量中小投资移民构成的中国人社区逐渐出现，这些中小投资移民缺乏有效组织，联系松散，他们和当地人杂居共生，鸡犬相闻，一旦因某些偶然因素引发冲突，便可能引发平时积郁的宿怨，最终酿成祸端。2008年8月，阿尔及利亚爆发的少数中国人和当地人之间的群体冲突就是明显例证。此次冲突原本只是一次孤立事件，但后来几名商人间的冲突被放大为族群事件，这与大量中国建筑工人、商人涌入当地，令当地人觉得饭碗被夺有关。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中国商户如同雨后春笋般增多，而当地商铺却有不少难以为继而关门。

（三）居住国的政治斗争和政治动员

排华事件的发生绝非偶然，更多是居住国政治动员的结果。抨击执政党与中国的关系，成为反对派扩大政治影响力的手段，这尤其表现在南部非洲国家，如赞比亚、莱索托等国反对党批评中国投资者是“新殖民主义者”、“剥削者”，甚至提出了驱逐华人的口号。^[23]

2006年赞比亚大选前夕，赞比亚反对党领袖迈克尔·萨塔（Michael Sata）大肆攻击中国，称中国、黎巴嫩和印度的商贩不是投资者，而是“麻烦制造者”，将中国企业的劳工标准和中赞经贸关系问题高度政治化，希望借此获取选民的支持以赢得大选。萨塔的反华论调引起了客观中立的赞比亚学者和非政府组织的强烈批评。2007年，赞比亚的两个非政府组织联合发布了一份关于赞比亚矿业领域发展现状的研究报告，驳斥了所谓的“中国投资者是赞比亚铜带省最恶劣的投资者，印度公司是第二恶劣的公司，而通常被视作‘白人’的瑞士、英国、南非、加拿大和其他投资者则是最好的投资者”的说法。报告指出这是一种典型的种族主义观念，赞比亚矿工劳动条件急剧恶化是私有化进程导致的，无论是南非还是西方公司都存在着严重的劳工问题，而且中资矿业公司向赞比亚政府所缴纳税额远远高于西方公司。^[24]

在很多非洲国家，由于华人是“新来者”，与当地社会融合程度较低，“很容易被视作是外人，时常成为所在社会自身问题的替罪羊。”^[25]某些非洲国家出现的“排华事件”并不是单纯针对华人的，而是民族“排外情绪”的反映，折射出非洲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曲折性。^[26]

（四）西方媒体的大肆渲染

近年来，随着中非关系的不断扩展与深化，中非关系也遭到西方国家及其媒体的曲解、攻击，一些非洲人和民间组织也对中国在非洲的发展产生疑虑，随之而来出现了指责中国在非洲的“新殖民主义”，出现了援助方式破坏非洲发展、中国在非洲掠夺资源、破坏当地环境等论调。^[27]由于西方媒体的巨大影响力，这些对中非关系的误解和指责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也极大地影响了非洲民众对待中国新移民的态度。

总之，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中非经贸关系的全面深化，大量中国新移民涌入非洲大陆。这批新移民主要以投资移民和劳务移民为主，具有来源地多样化、动机单一鲜明、发展速度极快等特点。中国新移民对于非洲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日益赢得非洲国家政府和民众的认可。

中非民间关系的深化，有赖于这些新移民的经济成就、融入当地社会的努力及其对于居住国的社会贡献。就目前情况来看，除少数的移民个人具有较为突出的成就外，这一新移民群体还未达到足以在非洲各国产生影响的程度。语言、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可能会妨碍新移民融入当地社会，不过在一些非洲国家的中国新移民已经开始逐步适应当地环境。民间关系的深入有助于中非政府间关系的发展，假以时日，它定能为双边关系的发展奠定牢固基础。

〔注释〕

〔1〕李安山：《为中国正名：中国的非洲战略与国家形象》，《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4期。

〔2〕李安山：《中非合作背景下的华侨华人与国家政策之关联》，《侨务工作研究》2009年第1期；Ma Mung，

- “Chinese Migration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Vol. 4, No. 1 (May 2008); Yoon Jung Park, “Chinese Migration in Africa”, SAHIA occasional paper, No. 24 (January 2009); Deborah Brautigam,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70.
- [3] “Zambia: Government refutes Sata’s claims over Chinese nationals in Zambia”, *Lusaka Times*, October 27, 2007.
- [4] 《中国商务年鉴 2008》，中国商务出版社，2008 年，第 683 页。
- [5] 刘鸿武、王涛：《中国私营企业投资非洲现状与趋势分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8 年第 5 期。
- [6] 李安山：《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历史、规模及其影响》，《外交评论》2009 年第 1 期。
- [7] 《赞比亚有一个治疗艾滋病的中医专家》，《中国中医药报》第 2259 期。
- [8] Ma Mung, “Chinese Migration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p. 99.
- [9] “Africa a Frontier of Opportunity for Expanding China”, *AP News*, February 8, 2007.
- [10] Gregor Dobler, “South-South trade relations: the example of Oshikango, Namibia”, unpublished paper, May 2005; Heidi Østbø Haugen & Jørgen Carling, “On the edge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the surge of baihuo business in an African city”,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8, No. 4 (July 2005) pp. 639–62.
- [11] Jørgen Carling & Heidi Østbø Haugen, “Mixed Fates of a Popular Minority: Chinese Migrants in Cape Verde”, in Chris Alden, Daniel Large & Ricardo Soares De Oliveira (eds), *China Returns to Africa*, Hurst Publishers Ltd, 2008, p. 329.
- [12] 《中国个体商人淘金非洲艰苦创业 “敢想敢干”》，人民网，2005 年 8 月 17 日。
- [13] Barry Sautman & Yan Hairong, “Trade, Investment, Power and the China-in-Africa Discourse”, <http://www.japanfocus.org/-Barry-Sautman/3278>.
- [14] 李智彪：《对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的实证分析与思考——以埃塞俄比亚中资企业为研究案例》，《西亚非洲》，2010 年第 5 期。
- [15] 张宏明：《非洲发展问题的文化反思》，《西亚非洲》2001 年第 5 期。
- [16] Pengtao Li, “The myth and reality of Chinese Investors: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Investment in Zambia’s Copper Industry”, SAHIA Occasional Paper, No. 62 (May 2010), p. 12.
- [17] Deborah Brautigam,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Dambisa Moyo, *Dead Aid: 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 Better Way for Africa*,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0.
- [18] Chris Alden, *China in Africa*, Zed Books, 2007, p. 49.
- [19] “Africa: China’s Great leap into the Continent”, *Reuters*, March 23, 2006.
- [20] Phil Alves, “It’s Time to Stop Blaming China Alone over Textiles”, *Business Day* (South Africa), June 12, 2006.
- [21] J. Van Eeden & T. Fundira, “South African Quotas on Chinese Clothing and Textiles: 18 Month Economic Review”, Tralac Working Paper, No. 08 (2008).
- [22] Harry G. Broadman, *Africa’s Silk Road, China and India’s New Economic Frontier*, World Bank, 2007, p. 22.
- [23] A Half, “The Panda Menace”, *the National Interest*, Issue. 90 (July–August 2007).
- [24] Alastair Fraser and John Lungu, “For Whom the Windfalls: Winners and Losers in the Privatization of Zambia’s Copper Mines”, Civil Society Trade Network of Zambia and Catholic Centre for Justice, Peace and Development, 2007.
- [25] Giles Mohan & Dinar Kale, “The invisible hand of South-South globalization: Chinese migrants in Africa”, Unpublished report for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2007, p. 14.
- [26] Norbert Kersting, “New Nationalism and Xenophobia in Africa: A New Inclination?” *Africa Spectrum*, Vol. 44, No. 1 (2009).
- [27] 李安山：《论“中国崛起”语境中的中非关系——兼评国外的三种观点》，《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年第 11 期。